

书乡漫录

曹培根



【书林清话文库】



河北教育出版社

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02SJB870001)

书林清话文库

主编 傅璇琮 徐雁

书乡漫录



曹培根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乡漫录/曹培根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12

(书林清话文库/傅璇琮, 徐雁主编)

ISBN 7-5434-5653-2

I. 书… II. 曹… III. 私人藏书-研究-常熟市
IV. G258.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0616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653-2/G·3667
定 价 29.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邮购电话: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从《学林漫录》丛刊 到《书林清话文库》

(代序)

傅璇琮

我于1951年秋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求学，至1952年8月，随我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而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后毕业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本以为就此可以在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坦途上前进了，不料在1958年年初，因所谓的“同人刊物”问题，与乐黛云、褚斌杰、裴斐和金开诚等人一起被诬为“右派集团”而身心俱受打击。

1958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被贬逐至商务印书馆。我在北大是教书，只不过三四年，而且那时只是个助教，跑腿儿的机会多，真正上堂讲课不过少数几次；到出版社是编书，倒是每天与书打交道了（当然，“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年除外），编书生涯占去了一生中的大半辈子。但现在稍稍作一些回顾，编出的书真能惬意的，却也似乎不多。能说得过去的，我觉得只有《学林漫录》丛刊那一种。

到“商务”那会儿，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但自我感觉似乎已入“中年”。那时“商务”在北总布胡同10号，由几个四合院组成，都是平房。

我所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在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帮手，也或许看到我刚从大学出来，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做这件事。

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越缦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遗漏的部分。李慈铭也可以算是我的乡先辈，大学念书时读《孽海花》，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

已，现在是把读他的日记当作一件正经工作来做了，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我虽然头上已戴了“帽子”，但那时对脑子里的“东西”却似乎还拘查得不严。

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里，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许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儿忘记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但好景不长，1958年7月，由于几个老牌出版社“专业分工”的确定，我又被调转至中华书局。随即转入纷繁的编书生涯，“商务”那段短暂而悠闲的生活结束了，从此，“此情可待成追忆”（李商隐《锦瑟》语）了。

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告诫我：“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安心看稿。”他是懂得爱惜专业人才的，并不让我去“下放劳动”，而是把我圈在作者的书稿中，专致于编辑业务。我为审读有关书稿，就上自《诗经》下至《人境庐集外诗》地翻阅了不少书。我在《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的序中有过回忆：

按照我当时的政治处境，是不能写文章往外发表的。于是我白天审读、加工稿件，晚上看我要看的书。当时我处理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我提议由中华书局搞一套“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领导同意这一方案，于是把陈先生的这部书改名为《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我自己就搞《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和《杨万里范成大卷》。

我平时从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夜间翻阅。每逢星期天，则到天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所带的馒头伴着图书馆供应的开水当一顿午饭。我的近二十万字的《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和七十余万字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出来的，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点。我没有荒废时间。

我那时就想尝试一下，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虽为他人审稿、编书，当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

应当说，中华书局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我做学问的底子。我始终对这个环境是有感情的。我在《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1月初版，2003年5月重印）的“重印题记”中说过：“我在编辑工作中学到了那时大学环境中学不到的许多实在学问，这也得力于中华书局在学术界的特殊位置。但后来却又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欺凌，以及因所谓世态炎凉而致的落井下石的遭遇。但我这个人毕竟是个书生，从50年代起，不管环境如何，总是抓时间读书作文。”

不过，头几年的事务也确实丛杂得够呛。

刚到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即碰到新编唐诗三百首之事。在1958年的大浪潮中，对古人一切都要推倒重来，说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美化封建社会”，对今天的读者毒素很大，我们要新编一本来加以“消毒”。新编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依据什么“标准”。既然反旧编之道而行之，旧编“美化封建”，我们现在就要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于是以民间作品为主，把相传为黄巢的“反诗”以及民歌民谣优先选入，再收白居易、杜荀鹤等所谓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编辑室内屡次为某些作品入选与否争来争去，编辑室一位副主任，可称“三八式”干部，后来总结这次新编的工作，认为自始至终贯串“两条路线”的斗争，无疑是我和其他几位列入错误路线中去的。她解放前曾在邓拓手下做过事，有老交情，于是请邓拓当顾问，这本“新编”的前言即出于邓拓之手。当时大家都洋洋自得，认为牌子硬。

殊不料“福兮祸所伏”，1966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时，把《新编唐诗三百首》也揭发出来了，说是邓拓借选诗，把唐诗中描写黑暗的作品大量选入，是借此攻击“大跃进”、“总路线”，把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搞得暗无天日、一塌糊涂。

那时我还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春夜静寂时，读到《人民日报》上的这一揭发批判文章，真是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我是参与者，明明白白知道诗是编辑室内的人选的，只不过选成后邓拓看看，怎么忽而变成是邓拓选的了，而且是邓拓借此而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了！安阳是殷墟的旧地，甲骨文是我们文明的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个农家的昏微灯光下，面对着这篇“檄文”，真感慨于我们古老的历史传统中一种可怕阴森的东西。

《新编唐诗三百首》工作于1958年10月间结束，随即转入杂务。记得我刚进中华书局时，一位编辑室主任曾给我一部明季抗清的文臣写的文稿《邢襄奏稿》和《枢垣初刻》，叫我写一篇“出版说明”；后来还经手过顾颉刚先

生标点的清人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第三部是《顾亭林诗文集》，除了通阅、标点外，还要各写数千字的有评析的说明文字。1958年至1959年间文教战线“拔白旗、插红旗”，北大中文系师生编了一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编辑室领导又命我做该书的责任编辑。而自60年代初期起，我又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这样的一种上下千余年的工作，对于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锻炼”，但它们对于我也是一种事业上的兴趣，并不只是作为一种“任务”，我在理智上觉得应当把它做好。

而对于《学林漫录》，则完全是出于一种趣味上的爱好。1979年至1980年间，我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由于工作关系，我在古典文学界之外，又结识了历史学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学者，交友面比过去稍广了。我感到史学界的研究者，专业性似乎比古典文学界为强，对学术课题钻研较深，但他们与古典文学界中一些朋友一样，大多希望在专业范围之外，浏览一些虽然也是学术问题却比较轻松的漫谈式的文章。这时，我正好从朋友处看到香港出版的《艺林丛录》，受到启发，觉得不妨也编这样一种不定期的学术小品集。这正是《学林漫录》初集“编者的话”所说的缘起：

不少文史研究者或爱好者，愿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就平素所感兴趣的问题，以随意漫谈的形式，谈一些意见，抒发一些感想。而不少读者，也希望除了专门论著之外，还可读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作品，小而言之，可资谈助，大而言之，也可以扩大知识面，开阔人们的眼界，启发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学林漫录》的出版，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

至于编选的宗旨，仍用“编者的话”说便是：

《学林漫录》的编辑，拟着重于“学”和“漫”。所谓“学”，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术性，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如顾炎武所说的“废铜”。所谓“漫”，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时，写了一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七律，有这样两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是很有意义的。杜甫在他后期，诗律是愈来愈细了，但自己却说是“漫与”，似乎是说诗写得再怎么经心了。这不是谦词呢？不是。老杜经历了大半生的戎马战乱，在离乱的生活中心

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稍有闲暇，又读了不少书，只有在这样的深厚的基础上，才能写出“浑漫与”三字，就是说，看来不经心，其实正是同一篇诗中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拿杜甫这首诗中的诗句，来为我们这本书的“漫”字作注脚，恐怕是合适的。

《学林漫录》第一集出版于1980年6月。这一集是我一个人编的，筹备了大约半年，向一些文史界相识师友组稿。先是向我素所敬仰的启功先生索文，他欣然先写两篇，一是《记齐白石先生轶事》，一是《坚净居题跋》。启功先生的这两篇可以说是代表《学林漫录》的两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述近代有建树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文章，以及包括各种内容的学术小品。这在当时，对不少读者来说，都有一种新鲜感，因此，颇受文史界以及其他行业中人的欢迎。正如第三集的“编者的话”所说：

读者欢迎已出的初集和二集，大约就在它的别具一格吧。所谓别具一格，从内容上说，就是所收文章的面较宽。举凡近当代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记述，诗文书画的考析和鉴赏，古今著作的推荐和评论，以及读书随笔、序跋札记，只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均可登载。另外，从文章的风格上，我们主张不摆架子，不作姿态，希望如友朋之间，促膝交谈，海阔天空，不受拘束。

初集问世以后，我因其他事忙，就约了古代史编辑室的张忱石和文学史编辑室的许逸民两位合编。他们当时还不太忙，三人共同商量，事情就好办得多。《学林漫录》刊登学者、作家、艺术家的事迹，在当时为其他刊物所少见，而约请的写作者一般都是这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们的朋友、学生或亲属，亲炙日久，了解自深，行文又自然、真挚，读来使人倍感亲切。这是《学林漫录》的一大特色。前后所记述的有齐白石、陈寅恪、张元济、朱自清、陈垣、黄侃、邓之诚等四十几位人物。

《学林漫录》的文章一般只不过两三千字，是希望不要给读者以过重的阅读负担。有的还仅数百字，如俞平伯先生的《德译本〈浮生六记〉序》（第八集）和钱仲联先生的《重修破山寺碑记》（第十二集）。前者是吴小如先生约来的，后者是许逸民同志和我有一次与钱先生一起开会，钱先生随便谈起时向他约的。两篇都用文言写：俞先生的序潇洒清脱，一如晚明风格；钱先生的记则奥义丽辞，直追六朝译经。

但《学林漫录》所收也有长文章，一是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一次我到上海去，他说他写了老画家颜文梁先生年谱，几万字，当时哪家刊物都不能登，颜先生虽然无论人品画品都可称为近代中国油画界的开拓者，但人老了，知道的人不多了，实在遗憾得很。我遂以不拘一格为由向张、许两位推荐，在第六集一次性刊出。想要了解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油画的发展，此文是非读不可的。

另一长篇是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这是吴先生的旧作，比钱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谱更长，从谭鑫培一直说到周信芳，共八篇，总计超过十万字。这样当然不可能一集刊完，于是与小如先生商定，每集刊两篇。本以为这样的专门记述不易为众人所注意，却不想引起轰动效应，不但像启功先生那样的大学者赞不绝口，据我的大学同窗白化文介绍，北大一位化学系教师，每集必捧读吴先生的这一长篇连载，寝食俱废。更怪的是，据他说，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国工程技术界颇有建树的长者，于平静的回光返照中，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别无眷恋，只惦记着要看看吴先生对马连良的评议最后究竟如何（《读〈学林漫录〉》，见《书品》1987 年第四期）。

我们几个人还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从初集起，每一集的“学林漫录”四字，都分别约请一些学者或书法家书写，这样集合起来不啻是当代名人书迹，不但有观赏价值，还有文献价值。初集由我约了钱钟书先生题签，以后几集则是下列诸位先生：启功、顾廷龙、叶圣陶、邹梦禅、黄苗子、许德珩、许姬传、张伯驹、李一氓、赵朴初、王遽常、任继愈等，这也是别具一格之处。封面设计也是一贯的素雅沉静的风格。

自从 1980 年 6 月出版《学林漫录》初集以后，就进度和印数来说，可以说每况愈下，特别是在 1988 年出现了大滑坡。我曾就各集作了一个统计，初集 1980 年出，印了三万多册；第二、三、四集是 1981 年出，第五、六集是 1982 年出，第七、八集是 1983 年出，第九集是 1984 年出，这几集印数都在一万数千册。1985 年倒也出了两集（第十集、十一集），印数已跌进一万以内了。而 1985 年以后，1986、1987 两年都是空档，1988 年 1 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数只有两千五百册。

这当然要亏本，出版部的同志不热心，经营管理的同志也提了意见。而相识的朋友，包括不少作者，是仍然很关心的，见到必问有新的出来否？有的开玩笑地说：《学林漫录》的“漫”应该改为“慢”了。

结果第十三集于 1991 年 5 月出版，印一千册；八年后出版了第十四集，印四千册。后来又把它们集合起来，换了封面重印过一次。中华书局拟陆续新

编，但恐怕不可能每年都编辑新集了。

在编辑《学林漫录》的过程中，我对于那些谈书人书事的文章就十分有兴趣，先后主张刊登过《傻公子的“傻贡献”——嘉业堂藏书楼过去和现在》（许寅）和《书林琐记》（雷梦水）等，但毕竟侧重点不同，所用文章有限。多年前，在编纂《中国藏书通史》问世以后，曾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届毕业，到南京大学工作后曾经有过多次学术合作的徐雁教授谈及，在此领域尚有文章可做。他表示即可筹划一套《书林清话文库》，大可裨补学坛，沾溉书林。我以为文库的立意颇佳，有关各书的选题，如韦力先生的《书楼寻踪》、曹培根先生的《书乡漫录》、孟昭晋先生的《书目与书评》、刘尚恒先生的《二馥斋说书》、谢灼华先生的《蓝村读书录》、周岩先生的《我与中国书店》以及来新夏先生的《邃谷书缘》、徐雁先生的《苍茫书城》、虎闯先生的《旧书鬼闲话》、林公武先生的《夜趣斋读书录》、胡应麟等的《旧书业的郁闷》、范笑我先生的《笑我贩书续编》，都极有文献价值和文化涵义。

按20世纪初叶德辉曾著有《书林清话》一书，以笔记体裁记叙古代版刻、藏书情况，多有专门知识性的掌故。但他未说及何以名为“清话”。按陶渊明有诗云：“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与殷晋安别》）他与挚友临别，可以连续两夜（信宿）谈话，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谈，故更为亲切。又“建安七子”之一刘桢有“清谈同日夕，情眇叙忧勤”（《赠五官中郎将》之二，《文选》卷二十三）；东晋时名士殷浩因事离开京都，宰相王导特约其共叙：“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于是，“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文学》）。可见清话、清谈、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细叙之意。我想，读者披览这套文库，也必有此感。我读韦力先生之《书楼寻踪》、周岩先生之《我与中国书店》，既有一种沧桑之感，更有对书林的缅怀之情。现在在邓子平先生的倾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组稿，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来自各地的作者们的书稿，尽管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钟爱书籍文化、探究古今图书的学术趣味却是共同的，想读者必会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陶渊明《扇上画赞》）之趣。

《书林清话文库》即将付梓，按例不能无序，但又苦于事冗少闲，商诸徐雁君，徐君嘱以缀合旧文以为“代序”之法。四五年前，河北教育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我著述的两种书，如今又将印行本套文库，可见其赞襄学术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我谨致以谢忱。

2004年10月于北京西城六里桥寓舍

前言

常熟位于吴中腹地，古称海虞，春秋时属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国务院核定公布的九十九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境内有距今五千多年的崧泽文化、四千多年的良渚文化和西周至战国期间的吴文化等遗址。常熟英才辈出，人文蔚起。早在春秋时期有孔子惟一南方弟子、兴东吴文教的先驱言偃，唐代至清代有进士四百八十三名，近代有清“两朝帝师”、史称“状元宰相”的翁同龢。新中国成立至今，常熟籍著名学者、专家数以千计，其中有二十人当选为两院院士。以虞山为名的诗派、画派、琴派、印派、藏书流派纷呈，名满华域，蜚声海外。笔者自1978年春起在常熟虞山、尚湖山水古城里学习、从教，对常熟文化愈越产生浓厚的兴

趣。1992年，赵国璋教授主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江苏艺文志》，聘我主撰常熟市部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将《重修常昭合志·艺文志》所载先秦至清一千八百六十一人的四千一百九十一种著作一一以人系书、标注类目、考明存佚，进行常熟艺文普查工作。1999年又标校统稿《重修常昭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对常熟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初步整理。2001年起我受聘为常熟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特约编纂，参与《常熟市志》的修订工作，有机会接触常熟丰富的文史料。与此同时，在徐雁教授等的鼓励下，承担了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常熟藏书史》（02SJB870001），开始对明嘉靖后崛

起的常熟派或称虞山派在中国藏书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藏书家和藏书楼进行探讨。常熟是明清以来中国私家藏书中心,被誉为中国藏书之乡。本书所载主要文章便是这一课题探索的初步成果。此外,将部分常熟以外相关地区历史藏书研究文章和有关书人书事文章也一并收入。

对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具体指导和来自各方的关心、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所收文章定然存在疏漏之处,请专家们批评指正。

曹培根

2003年12月18日于常熟

目 录

前 言	1
-----------	---

虞山书人

江南名室脉望馆	1
瞿氏铁琴铜剑楼	4
翁同龢藏书的风貌	7
常熟“小藏家”	20
曹氏菱花馆藏书	29
顾祖禹籍贯之疑	44
常熟民国著述家	47

藏书盈邑

常熟私家藏书	86
“虞山派”藏书家	94
藏书流派及其比较	104
藏书开放思想与实践	113
常熟官府、书院与寺观藏书	117
吴中藏书家	129
吴中历史藏书研究述评	139

琴川书事

丁祖荫及其《重修常昭合志·艺文志》	147
《重修常昭合志·艺文志》补正	153
《常熟市志》藏书部分补正	160
常熟藏书史料	165

虞山书人

江南名室 脉望馆

明代万历以后，脉望馆与绛云楼、汲古阁以藏书雄视东南，江苏常熟也因此而成为全国的私家藏书中心地。

脉望馆藏书从赵用贤（1535～1596）算起，可与距今四百三十余年、被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宁波范氏“天一阁”相媲美。赵用贤父承谦，官广东布政司参议，家多藏书。赵用贤从小爱读书藏书，隆庆五年（1571年）中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吏部左侍郎，有机会得见国库秘本，因勤于抄写购藏，成为远近闻名的藏书家。其子赵琦美（1563～1624）以父荫补官太仆丞，迁刑部郎中，授奉政大夫，曾在京都任都察院都事。赵琦美受父辈熏陶，卓有文风，尤其是在搜访和校讎刊刻典籍方面胜过其父，成绩突出。据赵琦美编订的《脉望馆书目》著录，他所



赵用贤像

收藏的图书近五千种、两万余册；据不完全统计，他所刊书达三十六种一百二十六卷，抄校了大量秘本。值得注意的是，赵氏父子的收藏志趣不只重视传统的经史，而是广泛搜罗古今典籍，甚至把眼光投向民间俗文学。赵琦美抄校辑集的元明两代稀见杂剧剧本《古今杂剧》，经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多位藏书家递藏，今存国家图书馆。这一戏曲瑰宝的发现，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中称为：“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赵氏父子的这种收藏，从今天看来，与宁波范氏刻意收藏当时的方志及政书、科举录等内部资料而成一特色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赵氏父子不是守籍奴式的藏书家，而是通过精校刊刻、编目作

跋、提供阅抄等途径交流私藏，提供文献。赵用贤所刻书，以校讎精善著称，《五经》等板刻纸墨上乘，可与宋版乱真。赵琦美校刊的《仲景全书》，被誉为研究伤寒的最好版本。赵用贤的《赵定宇书目》是明代遗留至今为数甚少的几部私家藏书目录之一，不少失传古籍据以窥见一斑。赵琦美的《脉望馆书目》，实开近世著录残宋元本先例。赵琦美的大量校跋文字，成为后人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并引发后人对藏书理论进行总结研究。

赵用贤藏书楼原在今江苏常熟市程家巷，即望仙桥畔，临流老屋名松石斋。当时，常熟知县王铎为御倭计，将城址西移，扩筑新城。于是赵用贤择城内西南隅西泾岸百叶街旁购地筑宅，自此百叶街改称南赵弄至今。赵琦美将书楼名之为“脉望馆”，取意于《仙经》“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楼址在今九万圩，即常熟市城区南赵弄十号。今大厅之东有宛香书屋及匾额，尚存完整。书屋之东厅，昔有园亭池馆，惜毁于太平天国时。

据文献记载及赵氏后人赵正平教授见告，赵用贤宅原东起西泾岸，西抵金李庵桥北堍。原有轴线三组，今东、西轴线之建筑已毁。现存为中轴线上的一组建筑，计有三进。第一进，门屋三间，因赵用贤孙赵士春崇祯十年（1637年）探花，原悬“探花

第”匾额，该匾今废。门屋以山柱分心，分隔前后，后部增置檐廊，檐下施五彩单翘单昂斗拱，梁、柱、檩交接点全用大斗架替木，额枋上绘有彩画。第二进，大厅三间，曾名“保闲堂”，匾额早废。厅前后置船篷轩，前部添檐廊一步，前檐较低。明间前增有抹角廊柱二，下置木楹础，前轩上部做草架，用复水椽遮盖成天花。厅内梁架皆作月梁状，并施有木雕，如镌有团鹤纹饰的三伏云，荷叶形的墩木，透雕的花机等装饰。梁枋斗拱均施彩绘，结合沥粉雕塑。山墙内壁下部，有砖刻卷草纹须弥座。其余装饰已废。第三进，入垂花门楼，为内院。后堂三间，左右附套间各一，系穿斗造。柱头料为天花遮蔽无法得见，每柱施覆盆木楹。东西两厢，各三间，用料纤细而不显简陋，尤以圆木稍加砍制，做成月梁，更见质朴自然。据考古专家们考定，此建筑形制为明代品官中低等级第宅规制，其建筑年代当在明万历前期。

在中轴线的东侧，靠大厅，有书厅三间，为脉望馆。此屋前后露明，宽敞明亮，便于贮书读书。今靠南格扇俱全，惟“脉望馆”匾额于1966年后被毁。庭中原有湖石山子一座及小池一泓，这与宁波范氏以水制火来保护书楼的设想相合，惜今已湮废。脉望馆于1982年11月被公布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0月又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赵氏书楼脉望馆遗址,这一江南一带屈指可数的重要文献库得以保护,其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不

可低估。江南明珠脉望馆,愿你永远璀璨夺目!